

新发现杨万里佚文《五一堂记》述考

萧 东 海

最近到民间查找有关资料，从《螺陂萧氏族谱》中新发现杨万里佚文《五一堂记》一篇。全文450字，字迹清晰，首尾完整，虽为《诚斋集》所不载，却确为杨万里的作品。现将其抄录标点如下：

五一堂记

乡先生萧岳英，三举于礼部不就，以特奏名官。三迁常德府武陵县丞，官期至，不肯之官。余在朝，亟白吏部谕其行。符下，又不果往。未几，余补外，还家，见岳英，问故，则笑曰：“吾老矣，堪佞佞折腰乎！”余方叹且高之。未几，岳英竟请老于朝。丞相止之，不可，乃言于上，以通直郎致其仕。宠命播敷，名流诸公争以书贺之。龙图阁学士胡公则曰“勇退绝人”，兵部侍郎周公则曰“林下见一”，中书舍人萧公则曰“急流勇退”。余闻，亦往贺之。见其所居之西偏新榜曰“五一堂”，问其名之之意。岳英曰：“此吾曾大父君美五福之故基也。吾肤于学而凉于德，且贫病，于谋五之一，吾窃庶几于吾祖也；二而五，岂吾所敢庶几于吾祖哉！愿子记之。”

余尝燕居，深念天下不难治，独患为者不能，能者不为，二者每工于相违而憎于相遭，天下不难治，不在此其将焉在？如岳英之才，易事不足以见之，愈难当愈见耳。今虽

老，其精神材力则尚少也，而又去其位，余方以为岳英贺，又以为国家惜也。

岳英之居，梁柱榱桷皆宝元、庆历以前物也，而左右前后环以数百年之老木寿藤。其上有鹤，夜寒露下，则嘎然而浹（啜），声闻数里，又不知何代物也。岳英葛巾藜杖相羊是间，年七十四而见如五十许人，鬓须黝然，无一茎白，其将于老木寿藤相永乎！亦又馭风骑鹤，餐朝露，酌天浆，以往乎山间也。余愿从之游焉。

淳熙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诚斋野客杨万里

这篇记文，载于族谱第二册《二主簿世基之裔·山头世系》萧岳英传后。同时载录的还有萧岳英《上宰相书》、杨万里《送客夜归呈萧岳英知县》诗和《萧岳英墓志铭》。《上宰相书》其实为杨万里所代作，《诚斋集》（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日本钞宋本，下同）卷65有《代萧岳英上宰相书》，即此。诗作于淳熙二年乙未（1175）春，《诚斋集》卷6、《四部备要》本《杨诚斋诗集》卷7皆题为《送客夜归呈萧岳英县丞》（按“县丞”是）。《萧岳英墓志铭》载于《诚斋集》卷128，族谱所载虽有舛误，如将“淳熙三年春，光尧庆寿”误改为“绍熙三年春，光宗庆寿”，就是因不明白“光尧”乃高宗赵构做太上皇帝时的尊号所致，这是明显的一例。但其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校勘价值，比如集载墓志铭云：“盖广出狭入，官吏并缘，剗剥市利，虐取苛留，征商其咨，间道以逋，官用告匱。税外干没，罔不涤除，曾不旬时，商旅走集。”族谱则于“官用告匱”之下更有“公既戾止，搜蠹日之，郡将自诡”十二字，这就弥补了钞宋本的文字脱漏。

《萧岳英墓志铭》（《诚斋集》本）云：“公讳许，字岳英，萧氏。其先自唐丞相复观察湖南，其子俭留家长沙，六世而徙庐陵。其后武宁令霁子焕国初徙白沙，今遂为吉水人。自定基与其孙服相继入为御史，至公之曾祖汝贤为将作监主簿，萧氏遂为庐陵大

家。公，服之从孙也。”萧焕徙居之吉水白沙，即族谱之称螺陂，其地与杨万里所居之南溪湓塘同属今吉水县黄桥乡。记文称“乡先生萧岳英”，称“还家，见岳英”，还有《欧阳伯威胜辞集序》（《诚斋集》卷77）也称“吾里萧岳英”，而《送客夜归呈萧岳英县丞》诗则更称“並舍频过”，皆足以见其村居相距之甚近，来往之密切。

而且，杨万里与萧岳英之间还有一种特别的亲密关系。定居吉水固然始自萧焕，但螺陂萧氏乃尊其父霁为一世始祖。据族谱，萧霁于乾贞二年（928）由吴主杨溥授以洪州武宁令兼知镇事职，乃由于其舅杨辂所荐奏。考杨万里撰《中奉大夫通判洪州杨公墓表》（《诚斋集》卷122）云：“六世曰辂，仕南唐，徙居庐陵。子铤为海昏令，公之六世祖也。”末则自称“曾侄孙万里”表；胡铨为杨万里父所作《杨君文卿墓志铭》（《澹庵先生文集》卷25）云：“至辂，仕南唐，徙庐陵焉。子曰铤，于公为八世祖。”是知萧霁之舅杨辂正是杨万里十世祖。而萧岳英则是萧霁八世孙。可见萧、杨二氏亲密关系源远流长。又，《萧岳英墓志铭》云：“男一人，特起。”据族谱，特起字廷卿，“配南溪杨氏文节公之姑也”。文节是杨万里的谥号。由此则知萧岳英之子特起又是杨万里的姑夫。《诚斋集》卷100《跋萧武宁告词》云：“今日延卿姑夫携访相示……自武宁至延卿，于是九世矣。”所称也正与族谱相合，唯“廷卿”因形近讹抄为“延卿”耳。明乎两人间这种亲密关系，则不但可证实这篇记文确属杨万里所作，而且对杨万里为何有《代萧岳英上宰相书》和《萧岳英墓志铭》等诸作，也可多一层理解了。

现再来考核记中所述史实。绍兴三十二年（1162）孝宗嗣位，萧岳英以特奏名授将仕郎，初调监常州犇牛镇。叶衡典是州，嘉其才，论荐于朝，乃移无锡令。会其秩满，力请自解，以犇牛课最增秩从政郎监潭州南岳庙。秩满，调全州清湘丞，改常德府；

武陵丞（见《萧岳英墓志铭》）。此即记中所谓“三迁常德府武陵县丞”。然而“官期至”而萧岳英“不肯之官”。是时杨万里“在朝”做官（乾道八年九月任太常丞兼权吏部右侍郎官，九年四月转将作少监），所以能有“亟白吏部遄其行”之举。这大概是乾道九年（1173）之内的事情。但“符下，又不果往”，亦即《萧岳英墓志铭》所谓“公雅不欲之官”。第二年（淳熙元年）正月，杨万里“补外”，出知漳州，但不赴任，很快回到了吉水。《送客夜归呈萧岳英县丞》一诗作于淳熙二年正月、二月之间，杨万里“还家，见岳英”的时间当在此之前。而由诗题中仍称“县丞”，则知萧岳英“请老于朝”，“以通直郎致其仕”，也当是稍后的事情了。是年，萧岳英“年七十四”。“淳熙三年春，光尧庆寿，恩加奉议郎……是岁十一月，朝廷有事于南郊……未几，以疾卒，年七十有五”（《萧岳英墓志铭》）。以上事实，可以证明这篇记文在史实内容和写作时间上都是十分可信的。

记中又提及“名流诸公”三位，他们的任职史实，与作记时间也尽无不合。“龙图阁学士胡公”即胡铨，字邦衡，庐陵（今吉安县）人，“淳熙二年，上思公不置，谕大臣令进职。初拟稍迁，上特升十等，遂为龙图阁学士”（周必大《胡忠简公神道碑》）。“兵部侍郎周公”即周必大，字子充，庐陵人，据《宋史》本传及《孝宗本纪》、《赵雄传》，其“兼权兵部侍郎”在赵雄使金之后，当不早于乾道七年。“中书舍人萧公”即萧燧，字照邻，临江军（今樟树市）人，“淳熙二年，累迁至国子司业兼权起居舍人，进起居郎”（《宋史·萧燧传》）。而且，他们也都分别与杨万里有着密切的交往。

记中萧岳英之云“吾曾大父君美五福之故基”者，君美，其曾祖汝贤之字；五福，堂名，亦汝贤之号。族谱载萧服（汝贤侄，《宋史》卷348有传）《宋故将仕郎吉州助教将作监簿萧君墓志铭》云，萧氏“世以儒学，至君（汝贤）之伯父御史公（定基）

始以才起为名，家声振一世，江西士大夫论缙绅望族必指萧氏为冠”；汝贤“资警敏，有志略，才力绝人，自其少时，御史公尤爱之”；然虽博学有文，却“再试礼部不合”，“于是退居，浮沉里闾，不复事科举”；“熙宁末，诏录庆历中尝与计偕者，人皆强君行，而君亟以疾自免”；后“朝廷推恩例授将仕郎，为吉州助教。时监察御史辛公炳举擢将作监簿，致仕，于其家闲居，益酿酒与亲朋故旧赋诗为乐”；“君春秋益高，精力如壮时，学问不稍倦，每自谓：‘洪范之福，我其无愧。’因目其平居宴息之地为五福堂，时人以五福先生称之”；“将终，尚与其门人探讨文籍，诸孙侍傍，笑语如平时，投其卷，若就寝，遂奄然而逝。实绍圣五年四月一日也，享年八十有二”。详知乎此，记中所述萧岳英榜其所居之西偏曰“五一堂”的良苦用意也就很好理解了。（据族谱，五一堂后改名衍福堂。但名称虽异，其意思还是一脉相承的。）

这篇记文，也真实可信地反映了杨万里的思想性格。记中，杨万里对萧岳英不恋禄位、知难而退的志趣大加赞赏，对萧岳英相羊老木寿藤之间、尽享养怡之福的乐趣则十分向往。全文结尾“余愿从之游焉”一句，反映了杨万里当时不想做官、专意隐居的思想情趣。对照《送客夜归呈萧岳英县丞》一诗，也正以语意绝相类似的“且伴先生学养生”一句作结。事实上，杨万里于淳熙元年正月出知漳州，即不赴任，而退居吉水，次年夏改知常州，又上章力辞，直至淳熙四年四月才赴常州任，其间弃官家居长达三年多之久。不仅如此，值得注意的是，杨万里在对萧岳英致仕表示祝贺的同时，又借题发挥，大发了一通议论。他说：“深念天下不难治，独患为者不能，能者不为，二者每工于相违而憎于相遭。”又说：“余方以为岳英贺，又以为国家惜也。”既抒发了杨万里对天下不治、贤者不用的愤慨不平，又表现了他对治理天下的独到见解和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关心与忧虑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江西省吉安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